

# 国外外交学

周启朋 杨闯 等编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INTERNATIONAL  
STUDIES

# 国外外文学

1998年 第4期 第148页



# 国外外交学

周启朋 杨 闯等 编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61/58/109

**国外外交学**

周启朋 杨 闯等 编译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顺义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11.375印张 241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

ISBN 7-81011-230-9/D·185 定价：4.20元

印数：0001—3000册

## 序

自从历史舞台上出现了国家之后，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或斗争在一般情况下都要通过外交手段来实现。经过无数世代的交替，世界各国都有自己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并有不少政治家将外交实践加以总结，提出一些关于外交的理论和学说。尽管外交同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乃至军事密不可分，而且彼此影响和制约，但外交仍逐渐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值得认真加以研究。本书将外国一些有代表性的有关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文章编辑成册，对我们进一步加强外交学的研究大有裨益。

外交是一个国家内政的延伸。一切外交手段的运用都是为了适应本国内政的需要。这条原理从古至今没有变化。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外交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过时的外交理论和原则将不断被扬弃，新的外交理论和原则将不断得到发展。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世界殖民体系的日趋瓦解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壮大，由于世界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国际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的倾向日益明显，要求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日趋高涨，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抗拒的潮流。这些变化对外交学的发展自然会带来重要的影响，因此，用发展的观点研究外交学是非常必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关系，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在外交理论和原则方面也有许多创新和发展。我们完全有条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为此，有必要广泛研究外国政治家和外交家在外交学方面的著述。由于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的差异，一些外国政治家的论点不可能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但他们整理和总结的许多具体实践经验，对我们仍有许多可借鉴之处。从这个角度讲，外交学院部分教师编译这本《国外外交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章曙

1989年12月

# 目 录

<b>一、外交的定义与本质</b> .....	( 1 )
外交的本质.....	( 1 )
外交和外交工作.....	( 10 )
外交概论.....	( 19 )
外交的发展和外交官职业.....	( 35 )
外交与外交方式.....	( 47 )
<b>二、外交的变化与发展</b> .....	( 66 )
新旧外交之间的过渡.....	( 66 )
新外交.....	( 80 )
当代外交趋势.....	( 102 )
世界联邦体系与外交.....	( 108 )
多边外交.....	( 120 )
公共外交.....	( 123 )
首脑外交.....	( 125 )
<b>三、外交谈判</b> .....	( 134 )
卓有成效的谈判.....	( 134 )
外交谈判.....	( 146 )
论外交谈判.....	( 160 )
<b>四、外交政策</b> .....	( 177 )
国内结构与外交政策.....	( 178 )

外交与对外政策.....	(209)
对外政策分析的理论框架	
及概念方法.....	(215)
比较外交政策理论研究的发展.....	(231)
外交与内政——双层对策之逻辑.....	(244)
<b>五、外交官的素质与培养.....</b>	<b>(257)</b>
外交官的素质.....	(257)
第三世界外交官的选拔与培训.....	(275)
当代职业外交.....	(284)
<b>六、外交起源与外交史的研究.....</b>	<b>(300)</b>
外交：历史、理论和政策.....	(300)
研究西方外交起源的意义、	
范式与理论.....	(313)
古代印度外交.....	(321)
封建罗斯外交.....	(324)
<b>七、外交礼仪.....</b>	<b>(337)</b>
礼宾礼仪与外交.....	(337)
<b>后记.....</b>	<b>(356)</b>



## 一、外交的定义与本质

什么是外交？这是一个既简明却又难于回答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各国的学者为外交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这些定义和解释带有不同的历史时代与社会文化的特点以及深刻的阶级烙印，但它们又有许多共同点。即：1. 外交对话是国际社会的工具，它产生于人类文明进程之中，适应了人类彼此沟通的需要；2. 外交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对外交往的能力反映该国的实力与地位；3. 外交是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也是建立和维持和平的国际秩序的手段；4. 外交的基本方法是谈判，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解决国家利益的冲突与矛盾，促进国际合作；5. 外交主要是通过国家外交工作机关，按一定的国际制度、惯例、准则和礼节来进行。外交工作有助于国家间相互理解和增进友谊。

### 外交的本质

〔英〕亚当·沃森

国家之间由于它们所处之世界特点而发生了外交关系。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若干个国家的存在，只要它们的行动相互影响，它们就不可能在真空中活动，每个群体就不可能

只考虑如何处理其内部事务。每个国家都希望尽可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它就不得不对会侵害其利益和其公民利益的邻国加以考虑，无论它认为这种利益是什么。严格地说，在一个独立国家的集团内，每个成员并不是绝对地孤立，而是在相互依存的状态下享有其独立，它们都应充分地认识这个事实。当一组国家形成紧密相连的体系时，这个体系就包括了许多按自我意愿行事的政治行为者，它迫使每个国家要牢牢地意识到其他国家，有着与其不同的目的和利益，其他国家所作或所可能作的事都将制约或部分地决定它自己的政策。18世纪末，琼—雅克·卢梭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把国家称作“政治体”。他说：“政治体为了知己就必须知彼。它依存于它所处的整个环境，它必须对所有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同样，今天我们地球上的每个国家不仅要依靠自身，更要依赖于整个世界环境。

凡意识到国外“发生的每件事”都会影响到其内部事务的国家，一定不会满足于隔河相望，它们会感到有必要在相互间进行对话。独立国家间的对话就是外交的本旨。它涉及这些国家政府进行对话的方法，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系列允诺、契约、机构和行为准则。

因此，外交的基本条件是多元性。它产生于这个由许多独立国家共处的、相互依存的世界。如同家务事的处理，若干决策者都清楚每一方的行动会对其他几方或者各方都造成长久的影响，因此就需要外交。最初，外交是在相距很远的国家中偶而发生的，如古埃及的法老王国与赫梯王国之间，他们的接触是通过商人的贸易和领土的争端。严格地说，外交的目的过去是，现在仍是调和独立实体对围绕它们的、被埃德

蒙·伯克称之为“环境帝国”的东西行使的政治意志。首先，我们应该指出：这个环境帝国基本上是由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体现的。

许多思想家谈到国家的本质时宣称：同外界打交道的能力是这种本质的基本内容，国家机制并不仅仅在于它能够左右群体内部的生活。他们认为，如果一个群体不具备能决定它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力量和范围的综合性权威，那么这个群体就从根本上没有能真正成为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些思想家还认为“主权”的核心就是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能力，即与它们对话的能力。一方面，国家的标志是同其他国家进行外交对话的能力，另一方面，对外交往的重要性实际上则因国而异。有时，一些国家间利益紧密相关，每个国家的活动甚至生存都要基本上取决于其邻国的行为，那么这种国家在做决定时，就必须考虑“对外政策优先”。这个看法是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提出的。它不仅指狭义上的政治和战略关系，而且指各种类型的对外交往，从军事冲突到国家与相关群体间通常相互引进商品和思想。在一个国家集团内，一方面各国不失去其独立性，另一方面每个国家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所有其他国家，对这样相互牵制的国家集团最好称之为国家体系，其意义正如我们所说的太阳系。这个名称是由17世纪的职业外交家普芬道夫提出的，他曾为几个国家工作。在服务于瑞典国王期间，他出版了《国家体系》一书。从此，这个术语得到广泛应用。至于历史上是否存在几个不同的国家体系，或者是否只有文艺复兴后形成的欧洲国家体系得到充分的发展并演变成当今的世界性系统，这些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进一步看，有的群体拥有共同的文化遗产，或具有大致相同的价值观，这些群体构成属于同一个体系的国家，它们积极地参与商品和思想的交流，以至它们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存性。结果，按赫德利·布尔教授的话说，那些国家会“认为他们自己在处理相互间关系时要受共同的规则支配，它们要一起参与相同机构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进一步地把这个体系看作是单一的国际或国家间社会，其成员国虽然政治上是独立的，但并不是绝对分开的实体，而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主权国家都不能单独地形成其文明和生活水准，不能单独地满足其人民的需要和愿望，只有在更广泛的社会中才能实现这些。按照查尔斯·泰勒教授的观点，在国际社会中，一个现代国家的产生需要“长期地形成一定的制度和惯例、法律准则、相同的礼节规矩、相同的思维习惯、相同的关系”以及文化融合的力量和利益的平衡。所有国家都真正关心如何维护由它们组成的整个社会和如何让它们有效地发挥作用，关心的程度取决于它们每一位的具体利益，这完全如同文明社会中每个人关心整个社会的功能一样。我们一般认为每个人对其所处的社会不仅要关心，而且有一定的道义责任，其中部分责任被规定为法律责任。但是，国家对国际社会的咨询责任和道义责任却没有规定得如此清楚。

从历史情况看，国家体系中多边外交对话之所以有效，不仅在于一批利益相关的独立国家偶然共存。过去，那些能够保持对话和经常对话的国家集团往往在地理上相邻，历史上关系密切。也就是说，这样的国家集团形成了具有政治力的磁场。它们的同一性取决于它们享有共同的文明，或与同

一文明保持密切的联系。它们按照那个文明所特有的法律观、荣誉观、道德观和判断方式去进行外交对话。即使是它们之间的战争，也并非不受任何限制的暴力行动，它要受这个体系的规则支配。在战争中，这样的国家集团不仅承认对国家诉诸武力的权力和进行战争的方式作了规定的“战争法”，而且还在一定的独立程度上，承认对待敌人和中立者的某些准则，承认其他成员国，包括敌人所拥有的权利。如果这些国家在其原有的地区以外进行扩张，它们一定仍会遵守它们的责任、法律和行为准则。

举例来看，在欧洲的国家社会中，外交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有机的机制，具有其特定的风格、方法及一整套程序、规则、协议和约定。如此组合成的欧洲体系能够对其成员的决定施加影响和限制，因为它们从一开始所受到的限制就已远远超出政治范畴。欧洲各国都深受中世纪拉丁语区基督文化传统的影响，后来发生的分裂和割据从未能全部地排除这种继承下来的统一性因素。其他国家体系，如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也都有了高度发达的外交。但是数百年后，它们全部被融合到象罗马和中国这样的靠征战形成的帝国之中，而没有把依然处于其文明以外的其他类似国家囊括进来，西欧例外。欧洲的外交要求其独立的成员国具有使国家体系运转的复杂技巧和高度意识。人们一般认为，这主要归因于一个特别的现象：与其他国家体系的经验截然不同，事实证明西欧国家体系中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得能够长久地吞并或控制所有其他国家。从大约公元1500年这个体系开始发挥作用时起，到本世纪中叶这个体系已具有世界性影响时止，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国家间不总是存在一种严格的多边均势，

然而大国都一直有意识地保持平衡，防止权力长期把持在某一个统治当局手中。在这种环境中，外交是必不可少的，它变得极为活跃。所以，欧洲外交能够高度发展并组成一个世界性体系。

只是到了本世纪，国家体系才第一次真正地具有全球性意义，包括了不同的文化和信仰。这种扩展对外交准则和实践有什么影响呢？孕育了我们全球体系的欧洲外交的发展在于其体系成员间的对话，它们曾经具有几乎相同的文化和历史，因此它们能够承认一定的准则。为了了解某一种外交实践，有必要回顾其历史起源和文化背景。因此，我们必须记住，今天外交的起源是在欧洲，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它的不足之处在什么地方，如何才能顺利地适应它，在某些方面如何对它进行全面的改造，使其适合全球性发展和激烈变化的需要。尽管我们津津乐道全球性的国际社会，但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并没有普遍承认由相同的欧洲文化遗产所产生的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进行外交对话显然好处很多。但是所有国家都需要它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在什么样条件下某些国家或某类国家可以不需要外交呢？如今难以在体系内找到一个试图抛弃正常外交对话的重要国家。然而在历史上却曾有过一些强大的以及微型的小国，它们一直保持孤立状态，或者长期不介入复杂的国际关系。这些国家往往在政治上或地理上处于一体化国家体系的边缘，或者根本与其不相干。由于大海或沙漠这样的自然屏障使它们远离活跃的国家体系，它们才能够成为国家体系的一个游离分子，或者同与这个体系紧密相关的国家保持适当的有选择性的关系。乔治·华盛顿向其人

民表示反对结成错综复杂的同盟，他认为过分地介入欧洲国家体系就势必需要结盟。然而，自那以后，美国介入越来越深，孤立主义的理想变得不那么现实。有时，有的国家由于太小而在外交对话中没有分量，历史的偶然性便把它们排斥在国家体系之外，如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和锡金。

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对美国和锡金可能的事情并不一定对其他国家普遍适用。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国。多少世纪以来，中华帝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种拥有宗藩结构的文明，它通常不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也就是说，它被隔离在大墙后面。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仅偶然控制过帝国政府的中枢。在孔子时代，外交曾有过高度发展，但一旦建立了“中央帝国”，它便忘却了土生土长的外交传统，因为取代了中国国家体系的统一帝国强大得足以支配其近邻，而对更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则无动于衷。19世纪中叶，由于最后一个统治王朝日渐衰微，中国无法再不理睬西方强国，它才第一次同意与西方国家进行正常的外交对话和交换使节。西方大国拥有军事优势和航海技术，并按照它们的方式同中国进行贸易，它们一步步地把中国拖入到国际政治之中。也就是说，当中国发现她面对的伙伴是一批独立的强大的国家时，她不得不同其他国家打交道。这种结果对中国来说是极为不幸和痛苦的。

为了把握住现代外交的演变方式，有必要指出：越来越多相距遥远的国家被卷入到无情的、无所不及的国际事务罗网之中，这一情况将对由这种罗网构成的国家体系本身产生影响。当一个国家加入已经组成的体系时，接受外交对话一事就要求新加入者做出重大调整。譬如在众所周知的现代外

交的发源地——西欧，独立成员间愿意保持永久接触的一个主要条件，就是：构成这个社会的成员国，无论大小，都具有大致相同的思想和法律上的对等观念。欧洲对话的条件显然是不能被中华帝国所接受的。出于多少不同的原因，穆斯林奥斯曼哈里发长期不愿意给予其他国家以对等的地位，苏联革命政府在较短的时间里也曾一度如此。但是随着它们的利益和目的越来越受到欧洲强国的牵制，这三个大国发觉同好些国家的对话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同意遵守那些外来的欧洲外交准则和惯例。至于这三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继续排斥产生欧洲外交准则和惯例的历史和文化，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当大批外来国家在短时期内加入一个体系时，情况就不同了，结果这个体系本身的扩展远远超出了它的文化摇篮。于是，需要做调整的就不仅是一方的事情，原有的成员不得不对新来者做出大量让步。如今，当代的全球体系就不断地吸收新的准则和惯例来取代纯粹的欧洲准则和惯例。

由于国家间的对话是私下里秘密进行的，它们对话的内容自然引起外界的好奇，人们便有时认为外交基本上是双边的。但是，把国家结成体系的纽带肯定是多边的。因此，当各个成员国制定对其他国家政策时，它对问题的考虑也是多边的。随着体系的发展，它们之间的对话变得越来越是多边的。只有最初步的外交接触才是纯粹双边的。同盟国和协约国，以及所有三个以上国家的代表聚会都是多边外交的例子。但是，这些对话还只包括了竞争的部分参加者。综合性的多边或“全方位”外交，也就是说在同一起谈判中包括所有或至少所有重要的体系成员，是更高级阶段的特点。通常它表现为，在长期的战争之后首先举行为了全面和平的谈判，



后来再组成象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样的永久性组织。因此，是用多边外交来完成双边对话，而不是用它来取代主权国家间的双边接触。

独立国家进行双边接触和在多边组织中开会不仅是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利益。况且，独立这个事实就孕育着猜疑。任何国家都可能虚情假意地说一套或许诺一通，即便它是真心的，也可能改变它的主意。历史上充满了政策相互冲突，表里不一和反复无常的例子，新闻每天都传来新的事例。外交的实质就是要解决这类问题。它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有组织的交流和谈判，它使每个独立政府能够了解其他政府的想法和打算。在发达的国际社会中，外交不单是作为交流和讨价还价的工具，它还直接影响到它的应用者。它是一种活动，即使经常被滥用，但还是有助于冲突的解决。外交对话的作用在于减轻国家间的矛盾，使其得到文明的处理，如果可能的话，对其进行调和，而不是压制或无视矛盾。解决利益冲突是外交的主要目标，但只有对话各方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保持这个体系的完整意义，明白在这个体系内促进各自利益应遵循的准则，外交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外交对话是国际社会的工具，一个建立在对其他民族所持观点的理解和尊重之上的文明过程，也是文明的方法。因为经常交流思想，努力寻求可被双方所接受的解决利益矛盾的方法，就能增进理解和尊重。这种表面上的文明性并不能排除外交被误用和滥用。外交的方法使人感到它难以捉摸。但无疑的是，它有助于了解别人的观点和需要，有助于寻求共同的基础和矛盾的解决。